

鑒真年譜

吳平 吳建偉 編著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江蘇省「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江蘇省『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吳平 吳建偉 編著

鑒真年譜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鑒真年譜 / 吳平, 吳建偉編著. — 揚州 : 廣陵書社, 2018.2
ISBN 978-7-5554-0964-9

I. ①鑒… II. ①吳… ②吳… III. ①鑒真 (688-763) 一年譜 IV. ①B94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38570號

書名 鑒真年譜

編著 吳平 吳建偉

責任編輯 金晶 王丹 胡珍

出版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349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無錫市極光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大學圖書館

裝訂 無錫市西新印刷有限公司 藏書 *

開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張 10.875

字數 2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54-0964-9

定價 88.00 圓

前 言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頂峰，也是中日人文交流的鼎盛階段。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佛教進入鼎盛時期的重要標誌。伴隨着佛教宗派的出現，中國化的佛教思想體系相繼成熟，佛教文學藝術日趨繁榮，佛教世俗活動和對外人文交流空前活躍。

隋朝統一全國後，南北兩地社會的發展漸趨一致，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溝通，佛教南北各家師說也逐漸出現了綜合調和、融會貫通的趨勢。這就為建立融攝各家之長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條件。同時，原來的佛教學派在安定的社會裏有可能固定於某一地方，發展起寺院經濟。有了物質基礎，也就具備了設立門庭、傳授僧徒的條件，因而師徒傳承，絡繹不絕，逐漸形成宗派。中國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表現出來。宗派與學派的區別是：學派是『所宗、所尊、所主』某種學說，呈鬆散結構的學說流派，祇重講說，不重師承；宗派則是有創始人、有傳授者、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相當確定的、具有師承傳法系統的佛教教派。

前 言

在中國佛教的八個宗派中，以律宗與鑒真的關係最為密切。律宗是中國佛教中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的一個宗派。佛教非常重視戒律的作用，從典籍上說，它是經、律、論三藏之一；從教義上說，它又居戒、定、慧之首。戒律隨佛教傳入中國，但在唐以前祇有律學，尚無律宗。中國律宗逐漸形成於隋唐時期，實際創始人為唐代高僧道宣。他以大乘律學會通小乘律學，把律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宗派——律宗。道宣曾受玄奘影響，用大乘教義講解《四分律》，晚年入終南山潛心著述，著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等五大部，受學弟子有一千多人，又被稱為「四分律宗」或「南山宗」。

鑒真就是道宣律師的三傳弟子，他生於武周垂拱四年（六七八），武周長安元年（七〇一）十四歲時從智滿禪師出家，唐中宗神龍元年（七〇五）十八歲時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道岸律師是道宣律師的再傳弟子，文綱律師的高足。景龍二年（七〇八）三月二十八日，鑒真在長安實際寺登上戒壇，由弘景律師授具足戒。

隋唐時期，由於國家統一，政治相對穩定的時期較長，封建經濟空前繁榮，對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中國古代文化開始進入了又一個旺盛的創造期。佛教十分重視通過文學、藝術、技藝等手段來表示其存在和活力，宣揚其教義和思想，這在隋唐時期尤為突出。在佛教文化影響下產生了以輝煌的文化成果為重要標誌的隋唐文明，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有魅力的一個組成部分。

鑒真就是這樣一個在隋唐文明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大師。遊學長安、洛陽期間，鑒真跟隨衆

多高僧學習佛法，由此而形成自己的特色：以律宗為本，融合佛教各宗派之所長。同時鑒真努力學習各種技藝和知識，對醫藥、建築、藝術等方面知識的學習更是孜孜不倦。刻苦的鑽研，廣泛的社會實踐，與各行各業工匠的長期接觸，終於掌握了醫藥、建築、藝術等領域的技藝和知識。通過醫藥、建築、藝術等手段來弘揚佛法，這是鑒真的個性化特色，而這種個性化特色又是始於隋唐文明的哺育。

大氣、輝煌的隋唐文明不僅培育了一代宗師，而且促進了中外之間的人文交流。當時的長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躍，外國僧人雲集長安，他們帶來了外國和邊疆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包括實物和技藝。鑒真遊學長安期間，通過與外國僧人的直接接觸，不僅學到了佛法，了解了外國的風俗文化和技藝，更重要的是被外國僧人那種為弘揚佛法而不畏艱難險阻的犧牲精神所感動，這對他以後決定東渡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鑒真東渡弘法對日本佛教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為日本佛教建立了嚴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發展的軌道；二是創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興盛奠定了基礎。鑒真雖然是律宗高僧，但律宗傳承佛教戒律，因此其涉及的對象是整個佛教界，并不局限於一宗一派。因此，鑒真為傳戒需要，既研習天台教義，又接觸佛教其他宗派，如密宗，是非常自然的行為。鑒真東渡，攜帶了密宗的佛像器物，有雕旃檀千手像一軀，繡千手像一鋪，不空絹索像。鑒真在日本期間，對密宗也很關注。這是因為密宗特別重視儀軌，絲毫不

亂。鑒真想利用密宗的這些優勢，促使日本佛教走上正軌。

鑒真東渡日本後，由於精通醫藥，被日本醫藥界奉為始祖。據日本史籍記載，當時日本人對於藥物有不懂的，請鑒真加以辨正。鑒真以鼻嗅之，一一分別，無一錯誤。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國現在書目錄》中載有《鑒上人秘方》一卷，是鑒真留在日本醫學史上的寶貴遺產。

景龍元年（七〇七），在薦福寺南安仁坊西北部建造小雁塔。當時恰逢鑒真的授戒師道岸律師監造小雁塔，鑒真細心觀察人們磨磚對縫、砌嵌密緻的修塔技藝，獲得了從設計、施工到裝飾等各方面的實踐知識。這些知識對他以後營建寺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鑒真東渡日本後，根據中國寺院建築結構建造的唐招提寺，成為此後日本佛寺建築的樣板。

由此可見，鑒真，不僅是盛唐時期名聞中華的高僧，也是日本「律宗的祖師」「文化的恩人」。身處這樣的時代，這樣的身份，不僅注定了鑒真在中日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注定了他在中日人文交流史上的顯赫位置。二十世紀以來，隨着中日關係的恢復與逐步推進，鑒真成了兩國對話中的熱門話題，鑒真研究也逐漸走向高潮。近些年來，伴隨着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中日關係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在這種形勢下，絕大多數愛好和平與友誼的兩國人民就更加崇敬和懷念鑒真。

二

近代以來，雖然鑒真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作為其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年譜的編纂却顯得相當滯後。目前雖然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鑒真年譜，但都存在着紀事簡略、體例雷同的問題，對於鑒真本人以及與其所生活時代的關係都缺乏充分的展示。

鑒真在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地位，其生平研究的現狀，以及新時期中日關係發展的新形勢，一部新年譜的編撰勢在必行。與已有各譜相比，這個年譜應該具備這樣三個特點：一是材料極為豐富，不再停留於大事記的形式；二是考證嚴密，結論公正；三是將譜主與所生活的社會環境緊密結合。祇有具備了這樣三個特點，纔能體現其作為新編年譜的重要意義。

首先，通過廣泛挖掘傳世文獻資料以及對二十世紀以來鑒真生平研究新成果的藉鑒與吸收，可以為目前已經相對停滯的鑒真研究帶來新的材料和新的推動力。

其次，在中日關係出現新格局的形勢下，重新發掘鑒真的一生，可以喚起長久以來留存於中日兩國人民心中的美好感情，鞏固和延伸中日兩國人民自古以來所建立的友好關係。

第三，鑒真的生平雖沒有留下什麼著作，但他在弘法的過程中，涉及了唐代宗教、政治、法律、醫學、建築、經濟、對外貿易、交通等領域的諸多問題，從整個唐代文化的角度而言，可以為唐代佛教以及政治、歷史、法律、經濟等諸多領域的研究帶來新的啓示。

二十世紀以來，隨着中日關係的逐步推進，鑒真研究也逐漸走向高潮。其研究地域在中國主要集中於大陸，在國外則以日本最為興盛。概括二十世紀以來的鑒真研究，討論的議題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關於作為鑒真研究主要載體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二是鑒真生平及有關東渡中的一些問題，三是鑒真的思想以及東渡對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尤其以生平經歷的研究最為集中。已經出版的有關鑒真研究的著作為例，其中以生平經歷為主題者就達一半以上。在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中，其中與生平事跡有關者也達到了將近一半。這些論著或就鑒真的生平事跡，尤其是六次東渡的歷程、鑒真佛教思想的傳承、鑒真在日本的佛事活動等進行全面分析討論，或對其生平中的一些懸疑問題，如生卒年、出身、出家時間、失明時間及病因、東渡的動機及財力等，進行考證研究，解決了一些問題，可以說從文獻的考證到理論闡述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也充分彰顯了鑒真研究的國際化特色。但也不難看出有關鑒真生平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一是選題面過窄，主要集中於六次東渡的過程及相關的人與事的考證、鑒真在醫藥及建築、雕塑方面的成就、鑒真在日本的活動等幾個方面；二是引用文獻重複，基本局限於《唐大和上東征傳》、《宋高僧傳》等幾部文獻，新材料的發掘明顯不足；三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鑒真研究出現停滯，成果數量急劇下降；四是不少論著都具有通俗讀物的特點，感情色彩濃厚，紀念意義較強，而學術含金量不足。特別是在鑒真年譜的編撰方面，尤為不足。我們目前見到的僅有十一種鑒真年譜。

這十一種年譜多者七千字，少者兩千字，雖然都能準確地勾勒出鑒真一生的基本事跡，但由於受到篇幅、體例、時代的限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各譜都以《唐大和上東征傳》為架構，以六次東渡的經過為主要內容，各自特點不明顯；其次，各譜都過於簡略，對於傳世地方文獻資料及近年鑒真生平研究獲得的成果吸收不够，二十世紀鑒真研究的突破和成就在年譜這一領域完全沒有體現出來，鑒真生平中的許多空白處依然沒有得到填補；第三，鑒真一生最大的功績是東渡傳法，而各譜對其在日本十年這一重要歷程的記述尤為不足。

有一點必須強調：這些年譜的作者都是鑒真研究專家，本人從他們的著述中獲得了不少教益，存在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史料的匱乏，而不在於作者，這也是鑒真研究難以突破的主要原因。

三

鑒真生活的盛唐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及佛教文化的鼎盛時期，在貞觀以來安定、富庶的社會條件下，整個社會對精神財富的追求被極大地激發出來，佛教宗派陸續創立，佛門高僧以不同的角色活躍於當時的社會舞臺。他們憑藉淵博的學識，或隱修荒山幽林，或出入達官顯宦之家，或赴異域取經弘法，對當時的政治、文化以及社會風尚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鑒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少入佛門，中年成為名聞江淮的高僧，五十五歲發願東渡傳法，歷經十二載艱辛，終於到達日本，以衰

老失明之軀在日本傳法十年，直至生命的盡頭。他的一生，足跡廣布，徒衆如雲，其經歷涉及唐代社會及同時期日本社會的政治、宗教、法律、經濟、文化、交通等諸多領域。

本年譜試圖在鑒真一生歷程的框架下着力凸顯高僧的成長及弘法、六次東渡、日本十年等三方面內容。對於六次東渡，主要以《唐大和上東征傳》的記述為基點，并對其中存在的模糊及疏漏之處進行考證和補充。

本年譜將把重點放到鑒真東渡傳法之前及日本十年兩個時期，前者鑄就了鑒真的佛學思想及人格、品質，後者成就了他一生的偉業。它們與六次東渡一樣，都是鑒真人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由於文獻資料缺乏，目前已有的各種鑒真年譜記載都很簡略。如關於鑒真發願東渡之前長達十五年的人生，各譜僅有十四歲出家、十八歲受戒、二十一歲行脚長安和洛陽以及二十六歲開講律疏等幾條簡單記載，而對於其人生中的重要活動如師承、遊歷、交遊、弘法等都缺乏具體記述。對於日本十年，現有各譜的記述也僅限於鑒真初到日本的幾次活動，對於他與日本各階層的關係、弘法傳戒的歷程、個人的遊歷及交遊等則沒有相應的展示。針對這些問題，本年譜將在現有各譜的基礎上，廣泛發掘、梳理中國地方文獻及日本文獻，并吸收現代中日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對現有各譜記述不足和空白的方面進行完善和補充，力求展現鑒真較為完整的人生軌跡。如鑒真東渡之前弘法活動，《唐大和上東征傳》的記載僅有兩處，極為簡略。其實在《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下「律宗」條下就可以發現這樣的記載：「年二十六，講《礪律疏》。至三十一，講《南山鈔》及《輕重

儀》。年至四十，講《羯磨疏》。」為瞭解鑒真東渡前的弘法活動補充了非常重要的資料。日本學者藏中進先生把《唐大和上東征傳》與《東大寺要錄》所引的《大和上傳》進行對比，發現前者失載了一些重要記述。如果在藏中進先生發現新史料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日本傳世文獻進行梳理，就可以在《續日本紀》卷二二《淳仁紀》「天平寶字二年（七五八）八月」條下發現這樣的記載：「庚子朔……其大僧都鑒真和尚，戒行轉潔，白頭不變。遠涉滄波……號曰大和上，恭敬供養。政事躁煩，不敢勞老。」可知鑒真被授予「大和上」之號是在天平寶字二年（七五八）八月，解決了鑒真生平研究中的一個困擾人們很久的問題。

本年譜本着「知人論世」的原則，在每一年『譜主事略』下附以『有關人物與大事』，不僅僅局限於人物傳記的範圍，以此體現出社會史研究的廣泛意義。

總之，本年譜在材料的豐富程度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敘述體例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并關注鑒真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由於條件的限制，這些努力、探索、關注做得還不够，今後還要繼續精進，為推進鑒真研究以及中日人文交流作出一份微薄的奉獻。

目 錄

前言	一	十一歲	公元六九七年	一七
一歲	一	十二歲	公元六九八年	一八
二歲	一	十三歲	公元六九九年	一八
三歲	四	十四歲	公元七〇〇年	一九
四歲	五	十五歲	公元七〇一年	二一
五歲	八	十六歲	公元七〇二年	二五
六歲	七	十七歲	公元七〇三年	二六
七歲	一〇	十八歲	公元七〇四年	二七
八歲	一一	十九歲	公元七〇五年	二八
九歲	一三	二十歲	公元七〇五年	三四
公元六九六年	一五	二十一歲	公元七〇六年	三七

二十一歲	公元七〇八年	三九	三十七歲	公元七二四年	七二
二十二歲	公元七〇九年	四五	三十八歲	公元七二五年	七三
二十三歲	公元七一〇年	四七	三十九歲	公元七二六年	七四
二十四歲	公元七一年	四九	四十歲	公元七二七年	七五
二十五歲	公元七一二年	五二	四十一歲	公元七二八年	七八
二十六歲	公元七一三年	五三	四十二歲	公元七二九年	七八
二十七歲	公元七一四年	五八	四十三歲	公元七三〇年	七九
二十八歲	公元七一五年	五九	四十四歲	公元七三一年	八一
二十九歲	公元七一六年	六〇	四十五歲	公元七三二年	八二
三十歲	公元七一七年	六二	四十六歲	公元七三三年	八四
三十一歲	公元七一八年	六三	四十七歲	公元七三四	八八
三十二歲	公元七一九年	六五	四十八歲	公元七三五年	八九
三十三歲	公元七二〇年	六七	四十九歲	公元七三六年	九一
三十四歲	公元七二一年	六八	五十歲	公元七三七年	九二
三十五歲	公元七二三年	七〇	五十一歲	公元七三八年	九三
三十六歲	公元七二三年	七一	五十二歲	公元七三九年	九四

五十三歲	公元七四〇年	九六	六十九歲	公元七五六六年	一五三
五十四歲	公元七四一年	九七	七十歲	公元七五七年	一五六
五十五歲	公元七四二年	九八	七十一歲	公元七五八年	一六一
五十六歲	公元七四三年	一一七	七十二歲	公元七五九年	一六四
五十七歲	公元七四四年	一三二	七十三歲	公元七六〇年	一七二
五十八歲	公元七四五五年	一四三	七十四歲	公元七六年	一七四
五十九歲	公元七四六年	一四六	七十五歲	公元七六年	一七八
六十歲	公元七四七年	一四七	七十六歲	公元七六年	一七九
六十一歲	公元七四八年	一四八	代宗廣德二年	公元七六年	一八七
六十二歲	公元七四九年	一六三	代宗大曆十一年	公元七七年	一九〇
六十三歲	公元七五〇年	一六九			
六十四歲	公元七五一年	一九九			
六十五歲	公元七五二年	二〇一			
六十六歲	公元七五三年	二〇二			
六十七歲	公元七五四年	二一九			
六十八歲	公元七五五年	二五〇			

附錄 鑒真研究論著目錄 二九二
 參考書目 三二七

鑒真年譜

一歲 公元六八八年

武則天垂拱四年，戊子。

譜主事略

鑒真生，一歲。

《鑒真和上三異事》：「謂沙門鑒真是大唐揚州江陽縣人，龍興寺之大德也。俗姓淳于氏，齊大夫苗裔也。……大唐萬歲通天二年，歲次己丑生也。」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卷三《釋鑒真傳》：「《延曆僧錄》第一云：釋鑒真者，廣陵龍興寺僧也。俗姓淳于氏，齊大夫淳于髡之後。」

《元亨釋書》卷一《唐國鑒真傳》：「釋鑒真，世姓淳于氏，唐國楊州江陽縣人，齊辯士髡之後也。」

《南都高僧傳》：「大唐龍興寺傳戒師也。揚州人。同寺知滿禪師并南泉寺弘景律師弟子

一歲 公元六八八年

也。」

《本朝高僧傳》卷二《唐大明寺沙門鑒真傳》：「釋鑒真，揚州江陽縣人。齊淳于髡之後也。唐嗣聖四年生。（原注：考，《異事》作唐萬歲通天二年歲次己丑生。）」

《戒律傳來記》卷上：「大唐萬歲通天二年生。」

《唐招提寺解》：「尋本鄉則江陽縣之人，謂俗姓則淳于之族。」

《招提寺千歲傳記》卷上之一《扶桑律宗太祖鑒真大師傳》：「太祖諱鑒真，世姓者淳于氏，支那國揚州江陽縣人。齊辨士髡之後也。誕于本朝人王四十一代持統帝二戊子，無年號，治世十一年。（原注：考，本朝已下廿一字，一本作「嗣聖戊子五年」六字。）

關於鑒真的年齡，文獻記載有七十七和七十六兩種說法。陳垣《釋氏疑年錄》卷四中以鑒真生年作垂拱三年（六八七）（廣陵書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五七頁），顯然據宋贊寧《宋高僧傳》「卒廣德元年（七六三），春秋七十七」的記載。《續日本紀》卷二四亦作「怡然遷化，時年七有十七」。但日本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作「春秋七十六」，係據鑒真弟子思託所記，應較可靠。今人汪向榮將年號記作「唐朝第四個皇帝中宗（李顯）嗣聖五年」（《鑒真》，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頁），而據《中國歷史紀年表》（新修訂本），嗣聖元年為六八四年，六八八年為武則天垂拱四年（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八六頁），此時中宗已被廢四年，汪說誤。